

# 花 火

期二第 卷三第

---

## 史大林與中國革命

托洛斯基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  
理論機關報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日出版

# 史大林與中國革命

托洛斯基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犧牲了無數工農的性命，結果卻幫助了革命的資產階級走上了政權。無產階級所能獲得的唯一報酬，只有那寶貴的與痛苦的經驗。

假使無產階級——至少是他的先鋒隊——真能獲得且能消受這一份經驗，那末這次大革命中成千萬鬥士們的鮮血，還不是白流了的，因為俗語說得好：一吃一會苦頭，一會乖，一失敗為成功之母！

但是整個的不幸也就在於此，這一份寶貴的教訓竟被那上次革命失敗的負責者——史大林——有意地隱藏了。他為的要保持自己永遠正確的威靈，更為的嬰無恥地適售左派反對派，所以不得不把那證明反對派立場正確的教訓封鎖起來了。

假使簡單地為了「面子」，不願意公開地接受這個經驗，那倒還有可說；但是史大林却實實在在沒有從這教訓中學得一點東西，這真是太無可怨了。

史大林黨在去年共產國際七大會上所決定的新政策，簡直澈頭澈尾地在重演着「一九二五——二七年的路線」。這路線無疑地將再來撲滅中國第三次的革命，其結果將更為悲慘！

為要了解目前史大林黨新政策的罪惡，我們必須詳細地研究上次大革命的教訓。因為史大林前後所應用的路線，完全是一貫的。

為此，我們不得不將托洛斯基同志這一篇舊文章趕快刊布出來，以供一切革命馬克斯主義者的研究。

所以關於中國革命的教訓，托洛斯基同志與俄國反對派曾經有過許多重要的文件，來加以研究。因為在本文中所敘述的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雖然是極重要的一部分。

——編者——

## 事實與文件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是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以後，在近代史上佔最重要地位的事件。在中國革命的許多問題上，共產主義的幾個基本潮流發生了衝突。目前共產國際的正式領袖史大林，在中國革命的事變中，表現了他真實的全形。關於中國革命的基本文件，已經拋散、消失與遺忘了。有些則被人們嚴密地藏匿起來。

我們要藉助於史大林及其親近助手們的文章和演說，藉助於他所授意的共產國際的許多決議案，來重描一下中國革命中幾個重要階段。爲此我們要引用蘇卷處的原有文卷。我們特別要引用一個青年史大林主義者其塔羅夫(Chitarov)，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上的演詞，這個演說是被史大林藏匿起來不公諸於黨的。讀者們將會自己相信其塔羅夫的供詞，有如何驚人的意義，他是一個青年的史大林官僚主義的肩客，一個中國事變的參加者，而現在正是少年共產國際的領袖之一。

爲了使事實和引證更爲明瞭，我們以爲喚起讀者注意一下中國革命中幾個最重要的事變，是非常有用的。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蔣介石在廣州第一次政變。

一九二六年八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有一個從國民黨派來的蔣介石的代表之參加。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蔣介石在上海舉行政變。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左派」國民黨在武漢實行反革命的政變。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宣說：留在「左派」國民黨內，是共產黨員的責任。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國共產黨採取暴動的路線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廣州暴動

一九二八年二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宣佈在中國採取武裝暴動與蘇維埃的路線。

一九二八年七月——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放棄把武裝暴動作實行的口號。

### (一) 四個階級的聯盟

史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政策，是建築在四個階級聯盟之上的。底下是孟雪維克柏林機關報對此種政策的贊揚：

「四月十日（一九二七）馬爾丁諾夫在真理報上，極有力的並且……用十分孟雪維克的態度，表示了官方立場之正確，這種立場即是堅認有保持四個階級聯盟之必要；堅認不要急於打倒聯盟政府，因為在這政府裏面工人們與大資產階級坐在一起；不能早熟地以「社會主義的任務」放在牠的前面」（社會主義通信第八號第四頁，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

與資產階級聯盟的政策，究竟像個什麼東西呢？我們且摘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正式機關報中的一段吧：



『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廣州政府頒佈了一個新的罷工法，在這法律當中，禁止工人攜帶武器作示威運動；禁止逮捕商人和企業家；禁止沒收他們的商品；建立強迫的仲裁委員會，制裁勞資衝突。這個法律包含了許多項目是保護工人利益的……但是與這些項目並列的還有其他的項目，他們規定在革命戰爭的時代，只許爲防衛的利益所必需的，才有罷工的自由』（共產國際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第九號第四百零八頁）。

在資產階級放在工人頸上的繩索中，還可以找到一些有利於工人的紗線（『項目』）。這個繩索的缺點，只是在於太緊了，竟超過了『爲防衛的利益（中國資產階級的）』所必需的程度了。這是在共產國際中央機關刊物上發表的。誰寫的呢？馬爾丁諾夫。什麼時候寫的呢？二月二十日，離上海大流血僅僅只有六個星期。

## （二）史大林心目中之革命的前途

史大林對於他的同盟者蔣介石所領導的革命，是怎樣估計牠的前途呢？底下是他那不名譽的宣言中之最不去醜的一部分（他那最去醜的部分，是從未公開刊佈過的）：

『中國的革命軍（即是蔣介石的軍隊），是中國工人和農民在求自己的解放鬥爭中之最重要的因素。因爲廣東方面的進展，便表示給帝國主義一個打擊，給牠在中國的走狗一個打擊，並且一般的說來，也就是表示中國一切革命分子得到集會、出版與組織的自由，特別是對於工人』（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第四十六頁）。

蔣介石的軍隊就是工人和農民的軍隊。牠給全體人民以自由，『特別是對於工人』。

那麼，爲使革命成功，需要什麼呢？很少：

『青年學生（革命的青年），青年工人，青年農民，假使都隨從在國民黨的意識和政治的影響之下，那麼所有這些人都是推動革命飛速進展的力量』（同書第五十五頁）。

這樣一來，共產國際的任務，不是把工人和農民，從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而是相反的，把他們附屬於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這篇文章，是在蔣介石被史大林武裝以後，跨在工農的前面，而使工農附屬於他，且『飛速的』走向上海大屠殺的日子寫成的。

### （二）史大林與蔣介石

自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蔣介石在廣州舉行政變以後（那時我們的報紙竟默無一言），共產黨便已減弱到國民黨之可憐的附屬品的地位，那時且簽訂了一個誓約，不批評孫中山主義；這樣，蔣介石——這確乎是一件可注意的瑣事——便出來主張共產國際容許國民黨的加入，他爲了準備自己作劊子手，他需要世界共產主義給他作遮飾，而他竟得到了。爲蔣介石與胡漢民所領導的國民黨，已被共產國際准許其加入（算是一個『同情的政黨』）。蔣介石當準備作堅決的反革命行動之時（一九二七年四月），他同時還很小心地和史大林交換像片。這種友誼的加緊，是藉布佈諾夫的旅行去拜望蔣介石完成的，他是中央委員會的分子之一，是史大林的一個代辦人。另外一件『瑣事』：即是布佈諾夫旅行到廣州的時候，正與蔣介石三月二十

舉變同時。布佈諾夫作了什麼呢？他教中國共產黨順從並且要保持安靜。

在上海的大屠殺之後，共產國際的許多委員會，都在史大林的命令之下，企圖否認劊子



手蔣介石仍爲共產國際之一分子。他們忘記了在政治局裏表決時，所有的人反對那一票（托洛斯基的），而且用調協一致的口氣，批准了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他們忘記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有國民黨的代表邵力子「同志」之參加，而這次會議正是責難左派反對派的。在邵力子所說的許多事情中，有這麼幾句話：

「蔣介石同志在他對國民黨黨員的演說中，宣說，假使中國革命不能正確的解決土地問題亦即農民問題，那麼革命將是不可思議了。國民黨奮鬥的目的，不是在中國國民革命之後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的統治，如同西歐所發生的一樣，如同我們看見的一切的國家那樣，只有蘇聯除外……我們都相信，在共產黨及共產國際的領導之下，國民黨將要完成牠的歷史的任務。」（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的記錄（德文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三〇三到四〇四頁）

這就是一九二六年秋天第七次全體會議裏面的許多事情。跟隨在共產國際的委員之後，「蔣介石同志」，也曾允許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之下，解決一切的任務，可是他僅僅解決了一個：恰恰是用流血手段打碎革命。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還竟有如下的決議：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爲：一切事變，完全證明了第七次全體會議的預言之正確。」

「證明是正確的」，那真是正確得澈底哩！假使這是幽默的話，那無論如何到不是隨意的幽默。我們決不可忘記，在這種幽默上面，深深的染了上海工人的血液。

#### （四）列寧的戰略和史大林的戰略



列寧規定共產國際對於落後國家的任務，是什麼呢？

『我們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以反抗在落後的國家裏面，企圖圍繞在資產階級民主解放運動的周圍，而用共產主義的外衣。』

爲了要實行這個戰略，那曾經允諾在中國『不建立資產階級統治』的國民黨，竟被准許加入共產國際了。

很明顯的，列寧也承認與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有作暫時聯盟的需要，但是同樣是很明顯的，他主張的聯盟，不是與資產階級的政黨聯合，以欺騙、陷害小資產階級革命的民主主義者（農民與城市小市民），而是與羣衆自己的組織和集團聯盟，以反抗民族資產階級。那麼，列寧所想像的與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聯盟，究竟是怎樣的方式呢？對於這個，他在爲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所寫的大綱上，予以答覆：

『共產國際應當與殖民地及落後國家的民主資產階級，作暫時的聯盟，但是決不應當與牠混合，並且一定要無條件的保持無產階級運動之獨立性，縱然無產階級運動還非常稚弱。』

史大林教共產黨與國民黨聯合，同時准許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這似乎都是執行第二次大會的決議。所有這些，總括起來都被稱爲列寧主義。

### （五）蔣介石政府好像是駁倒了馬克斯的國家學說

蘇聯共產黨的領袖們，在廣州第一次政變（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後一年，對於蔣介石政府，是怎樣的估計呢？這我們可以從政治局的委員們之公開言論中，看得很清楚。

這裏是加里寧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在莫斯科高次納克工廠的演說。

『中國的一切階級，自無產階級到資產階級，都深恨外國資本的走狗——軍閥；而中國一切階級之視廣東政府，則是全中國的國民政府』（新聞報，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另一個政治局委員魯茲塔克，幾天以後，在電車工人的集會上，也有個演說。真理報的記載是這樣：

『魯茲塔克同志，對中國的情勢深加考慮以後，他指出在革命政府的後面，有中國一切階級』（真理報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

伏羅細羅夫用同樣的精神，演說了不止一次。

列寧把馬克斯關於國家的學說，從小資產階級的污穢中清理出來，真是徒勞無功。不肖門徒們在很短的時期以內，竟拿雙倍的污穢將牠掩蓋起來了。

一直到四月五號，史大林在棧柱廳裏演說，還堅持共產黨應保留在蔣介石的黨內，而且他還否認他的同盟者有叛變的危險，他說：『有鮑羅廷在那裏警衛着』，然而蔣介石的屠殺正發生在他演說後的一星期。

## （六）上海政變是怎樣進行的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得到一個特別有價值的證據，那即是一個冒靚並且參加中國革命的莫塔羅夫的演辭，他是一個史大林派，他從中國回來正當聯共第十五次大會的前夜，他參加了大會並且有一個報告。但他的演講中許多最重要的部分，都被史大林從記錄中刪去了，可



是其塔羅夫自己是同意於這種舉動的；真實的情形，自然不能公開發表，恐怕牠將完全證明反對派對史大林的一切警告之正確啊。我們讓其塔羅夫發言吧（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第十六次會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對中國革命所加的第一次傷害，便是四月十一到十二之上海工人被屠殺。』

『關於這個政變，我將較詳細的說一下，因為我知道我們黨內很少人曉得牠。在上海曾經有過二十一天的所謂人民政府的存在，在這政府裏面，共產黨人佔多數。所以我們可以說，上海曾有過二十一天的共產黨政府。這個共產黨政府表現得十分消極，雖然事實上蔣介石的政變早已在準備着，每天都有爆發的可能。』

『這個共產黨政府，首先，在很長久的時間中，都沒有開始工作，其口實：一方面是在說，政府中之資產階級部分不願工作而且怠工；另一方面便說，武漢政府並沒有承認上海市政府的組成。這個政府的活動，便是頒佈了三個命令，而其中之一，說來就是，準備歡迎快到上海的蔣介石。』

『在上海這時候，軍隊與工人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尖銳。很顯然的，軍隊（托洛斯基按：即蔣介石的軍官們）已從容的準備了把工人趕上屠場。軍隊逼近了上海，但停止進軍至數天之久，他們不到城裏來，因為他們知道工人正在與奉軍作戰，他們希望工人在這個鬥爭中戰死，他們故意延遲進城。後來軍隊到了上海。但是在這些軍隊當中，有一師人是同情於工人的——那就是廣東軍的第一師。師長薛岳頗不見悅於蔣介石，蔣知道他同情於羣衆運動，因為薛岳自身，是來自下層的。他最初是一個連長，到後來才作師長。』



『薛岳到我們上海同志那裏來，告訴他們，一個軍事政變，已經準備好了，蔣介石把他召到司令部去，給他一個極冷淡的招待，他決定再不到那裏去了，因為他怕被蔣誘殺。蔣介石向薛岳提議，教他帶了他的全師，離開上海開到前線去；而薛岳則向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議，希望我們同意他不服從蔣介石的命令。他已準備留在上海，並且打算與上海工人共同作戰，以反抗已經準備了的軍事政變。』(那時黃埔軍兩個師長薛岳和嚴重都很動搖，而薛岳却沒有這樣的提議——譯者注)對於這個提議，我們中國共產黨的負責領袖們(陳獨秀同志也在內)表示，他們已經知道政變業已準備了，但是他們不願意與蔣介石作過早的衝突。這樣，第一師便調出了上海，而城市即被第二師白崇禧佔據了去，兩天以後，上海工人便被大屠殺』。

爲什麼要把這種真實而且生動的陳述，從記錄中刪去呢(三十二頁)? 因為牠究竟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問題，而是蘇聯共產黨政治局的問題啊!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史大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全體會議上說：

『反對派是不滿意的，因為上海的工人，未曾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作決死的戰爭。牠不懂得，革命之在中國，不能夠發展得很快。牠不懂得，我們不能在不順利的條件之下，進行決死的鬥爭。反對派之不懂得在不利的條件下避免決死的鬥爭(當牠能避免的時候)，就是表示使革命的敵人，更容易進行他們的工作……』

史大林這一段演說，題名爲『反對派的錯誤』。在上海的悲劇中間，史大林竟找出反對派的錯誤來。實際上，反對派在那個時候，還不知道上海的具體形勢，那即是說，還不知道三

月到四月初，情勢是仍然那樣有利於工人，雖然共產國際的領導是作盡了一切的錯誤與罪惡。我們就從那從容隱藏起來的其塔羅夫的報告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時的情勢，還是有救的。上海的工人，正取得了政權，他們的一部分已武裝起來，而且還有一切的可能，更廣大的武裝他們。同時蔣介石的軍隊，一天天的不可靠，其中有一些部分，甚至高級軍官，也傾向於工人方面來。但是每個事件和每個人，都被上級命令麻痺了。我們決不應準備決死的鬥爭反對蔣介石，而應開歡迎大會向他慶祝勝利。因為史大林從莫斯科下了他的絕對的訓令：不僅不要抵抗那同盟者蔣介石，而且相反的，你們要向他表示忠誠。怎樣表示呢？睡下來並且去死。

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五月全會上，史大林在技術的和策略的立場上，仍然爲他那不作一次鬥爭便作驚人投降的政策辯護，這種投降，引導了革命中的無產階級走上了潰散的途程。半年以後，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上，史大林竟是默無一言。大會上的代表，延長了其塔羅夫發言的時間，讓他有機會完結他的演講，因爲這個報告引起了他們深切的注意。但是史大林想出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就是把其塔羅夫的演講，從記錄中刪去。我們在這裏，第一次把這個真實的歷史文件，發表出來。

讓我們再注意一件有趣的事實：當盡可能的把事變的進程塗抹，並把那實際的罪惡隱藏以後，其塔羅夫便挑出陳獨秀的責任問題，直到那時爲止，史大林派在任何一點上，都是擁護陳獨秀以反對反對派的，因爲他曾單純的執行了他們的訓令。但是就在那時候，事情已經很明顯，陳獨秀同志，已將不願意作那緘默的代罪人，他要公開的討論上海事變之原因。其



產國際的一切卑鄙漢，後來把他開除了，並不是因為對革命的錯誤，而是因他不願欺騙工人，不願作史大林的掩飾品。

### (七) 『注射工農的血液』(於國民黨)的組織者

共產國際的領導機關報，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大約是上海政變三個星期以前寫道：『國民黨的領導，現在正患着缺乏革命的工農血液之症候，中國共產黨必定要幫助注射這種血液，那麼，情勢將急劇的轉變。』

這是怎樣一種胡言亂道啊！說國民黨是正在『需要工農的血液』。這種『幫助』是用最完全的方法供給的：在四五月裏，蔣介石與汪精衛，都得到了工農血液的滿足的『注射』了。

論及史大林政策中關於蔣介石的一章時，共產國際第八次全體執委會(一九二七年五月)宣說：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與民族資產階級聯盟的策略，在革命業已衰落的時代，是絕對正確的。僅就北伐而論(！)，牠已給了這個策略一個歷史的證明……』

北伐盡了怎樣的作用！

這裏是史大林所經過的道路。北伐竟意外的證明了是對無產階級的討伐，證明了他與蔣介石的友誼之正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作了牠一切能作的事情，使中國工人的流血，不能引為教訓。

### (八) 史大林重複他的試驗與『左派』國民黨聯合



其塔羅夫的演說，還刪去了底下極可注意的一段：

『在上海政變以後，對於每個人都是很清楚的，中國革命正在開始一個新的時代，資產階級正從革命中退出。這是人所公認，而且即刻都是這樣說的。但是有一件事與此有關的，卻沒有看到，即是：雖然資產階級正在退出革命，然而武漢政府，連想還未想到離開資產階級。不幸我們同志中的大多數，還不明瞭這種情形，他們對於武漢政府存有許多幻想。他們把武漢政府，幾乎當作偶像，以為牠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模型』（這一段被刪去的演說，在記錄中三十三頁）

『在武漢政變以後，很顯然的，資產階級是退出革命了……』

假使事變不是那樣悲慘的話，這到是令人發噤的事。在蔣介石拋開革命，反對了被史大林解除了武裝的工人以後，聰敏的戰略家們，最後『懂得了』資產階級是『退出』革命了。但是史大林既已承認他的朋友蔣介石已經退出，他還命令中國共產黨附屬於那同樣的武漢政府，按照其塔羅夫在十五次大會上的報告，這武漢政府是『連想也沒有想到離開資產階級』的。不幸『我們的同志都未曾懂得這個』。什麼同志呢？是膠貼在史大林電報上的鮑羅庭嗎？其塔羅夫沒有舉出任何名字來。中國革命對他是很親切的，但是他的自保，則對他更為親切。

這裏，我們听史大林怎樣說吧：

『蔣介石的政變，表示現在南方將有兩個營壘，兩個政府，兩個軍隊，兩個中心。一個革命的中心在武漢，一個反革命的中心在南京』。

革命的中心之位於何處，不是很明顯的嗎？在武漢！

『這是表示武漢的革命的國民黨，領着堅決的鬥爭，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牠將在實際上，轉變為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機關……』

現在，我們最後知道了工農民主專政究竟像個什麼東西了！

史大林繼續着說：『因此，在現階段上，在國民黨內部左派分子與共產黨員之密切聯合的政策，須以特殊的力量與特殊的注意來實行。……沒有這樣的聯合，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中國革命問題一二五至一二七頁）

沒有與反革命的土匪們——『左派』國民黨的聯合，竟說『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這就是史大林一步一步的——在廣州、在上海、在漢口——保證革命勝利的方法。

### （九）反對反對派、擁護國民黨

共產國際對於『左派』國民黨，是怎樣觀察的呢？牠的第八次全體執委會，在反對反對派的鬥爭中，對於這個問題，給了一個明白的答覆。

『共產國際以最堅決的態度，拒絕那退出國民黨的要求。……中國的國民黨，正是一種特殊形式的組織，在這組織裏面，無產階級直接與小資產階級和農民聯合』。

在這樣情形之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是十分正確的在國民黨裏面，看見了史大林的思想『工農兩個階級政黨』之實現了。

雷夫斯(Faes)並不是沒有名的人，他最初是拍特魯拉(Petrus)內閣下一個閣員，後來在中國實行了史大林的訓令，他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理論機關報



上寫道：

「我們俄國的反對派，是大家知道的，也主張共產黨員必須退出國民黨。這種觀點的擁護，將會引導贊成退出國民黨政策的人，到一九一七年托洛斯基所宣佈的那有名的公式去：『不要沙皇，要一個工人政府』，可是在中國牠要改變一個形式才行：『不要軍閥，但要工人政府』。我們沒有理由去注意這些堅決主張離開國民黨的人」（無產階級革命五十四頁）。

史大林——雷夫斯的口號是：『不要工人，但要蔣介石！』『不要農民，但要汪精衛！』『反對反對派，但要擁護國民黨！』

### (十) 史大林再來解除中國工農的武裝

在武漢時代，領導的政策是什麼呢？我們且聽史大林主義者其塔羅夫關於這個問題的說話吧。底下一段是我們在十五次大會記錄中讀到的：

『當整個武漢時代，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策是什麼呢？牠的政策是在退却的口號之下進行的……』

『在退却的口號（在革命時代的，在革命鬥爭的最緊張時期的）之下，共產黨進行牠的工作，並且在這個口號之下，向一個個的情勢投降而不作一次鬥爭。以下一些事實都是屬於這種投降的：同意把一切工會，一切農民協會及其他革命的組織，附屬於國民黨；不得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准許，不作獨立的行動；決議自動解除漢口工人糾察隊的武裝；解散武漢童子團的組織（並無解散童子團的事——譯者註）；在國民政府的領土以內，實際上衝毀了



一切農民協會；諸如此類。」

這裏把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描寫得極其明白，牠的領導，實際上是幫助「民族」資產階級，衝散人民的暴動，並且消滅了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最好戰士。

但是這明白的描寫，是很奸詐的，上面的引證之印在記錄上，是在用幾行虛點代替刪節的那段以後。底下是被史大林隱藏起來的一節：

『在這個時候，有一些負責同志，中國同志和非中國同志，發明了所謂退却的理論。他們宣說：反動正從各方面向我們進迫，所以我們必須即刻退却，藉以保留合法工作的可能；假使我們退却，我們將能保持此種可能，假使我們進行防衛鬥爭或者企圖進攻，那我們將失去一切。』

正常武漢的反革命，開始擊破工人和農民的日子（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史大林當着左派國民黨的面前，在共產國際全體執委會上說（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和內容。漢口的國民黨及漢口政府，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中心』（記錄德文版第七十一頁）

一個工人，用書面提出問題，問爲什麼在武漢不建立蘇維埃，史大林答覆道：

『很明顯的，誰要在現在，要求在武漢區域，即刻建立工人代表聯維埃，那就是企圖跳過（！）中國革命中之國民黨的階段，也就是冒險把中國革命放在一個極困難的地位』。

正是，在一個『極困難』的地位！史大林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和學生談話中說：

『在中國，一般的說來，工農代表蘇維埃，是不是應當建立呢？是的，應當的，絕對應

當的。可是牠的建立，要在武漢革命政府強固以後，要在土地革命展開了以後，要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土地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

在這樣情形之下，史大林從沒有想到，在武漢政府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沒有加強他們的地位以前，可以經過蘇維埃，加強工人和農民的地位。

俄國少數派的機關報，在那個時候，論及那有名的史大林大綱（這大綱是證明他的武漢政策的）說：

「在本質上說，從史大林大綱中引出來的『路線』，是很少可疵議的。盡可能保留在國民黨內黏貼在牠的左翼和武漢政府之上到最後可能的一分鐘；一避免在不順利的條件之下作決死的鬥爭；不發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因此不一給中國人民的仇敵以新的武器，來反對革命，來製造新的謠言，說中國進行的革命不是民族革命，而是人工的移植莫斯科的蘇維埃——實際上還有比這個更聰敏的政策嗎？……」（社會主義的通信第九期（一五——第一頁））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底開會，就是當武漢已經開始摧毀工農組織的時候，關於中國部分，還作了如下的決議：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堅決的喚起中國共產黨注意：必須採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強和發展一切工農羣衆的組織……在這些組織裏面，必須進行一種煽動，教他們加入國民黨，要把國民黨轉變為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和工人階級之有力的羣衆組織」。

「加入國民黨」，即是表示把自己的頭，白願的送上殺場。上海血的教訓，竟沒有留下一



點痕跡，讓牠空空的過去。共產黨員，如同從前一樣，已經被驅使得變成趕牛人，天天爲資產階級劊子手的政黨（國民黨）趕牛，並且變成了汪精衛和他的夥伴們之『工農血液』的供給者。

### （十一）史大林主義者試驗內閣主義

雖然有俄國克倫斯基政府的經驗和左派反對派的抗議，但是史大林還實行他的國民黨政策，而且試驗內閣主義：兩個共產黨員參加了資產階級的政府，一個作工人部長，一個作農民部長——真是抵押品的典型的位置呀！——在共產國際的訓令之下，爲保全聯合戰線，竟破壞了階級鬥爭。這樣的指令，是經常的從莫斯科用電報拍到中國，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八月我們且斯其塔羅夫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上，在代表所衆之前，怎樣形容共產黨的『內閣主義』，在實際中的情形吧：

『你們知道，在政府中有兩個共產黨員的部長』底下的演辭，便從記錄中刪去了：

「後來，他們（共產黨員的部長）便不與其他的一切部長們聚會了，他們不出頭露面了，可是在他們的部長裏，位置了上百的官員。當這兩個部長活動的時期，甚至連一個簡單的法令，使工農地位較優的法令也沒有頒佈。這種應受責難的行動，還不算稀奇，還有更可責難更可恥的結束。這兩個部長，一個說生病，一個說要到外國去，便以此等理由，請求免職。他們的辭職，竟沒有發一個政治的宣言，在這宣言裏面，他們應該說：你們是反革命者，你們是奸賊，你們是叛徒，我們再不願與你們在一起了。可是他們並沒有這樣作，一個宣說他確確病了；而譚平山則甚至寫道，他無法納廣大的農民運動於正軌，所以他請求准許他辭職。」

我們能夠想像還有比這個更大的羞恥嗎？一個共產黨員的部長，竟聲明他不能納農民運動於正軌。那麼誰能呢？很明顯的，軍人能夠，沒有別人。這是公開的承認武漢政府對農民運動之嚴酷的壓迫。

這就是有共產黨員參加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原形。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當史大林的演說和論文，在一切人的心中還非常新鮮的時候，其塔羅夫的報告，竟不能印出來，雖然其塔羅夫（年紀雖輕，但却非常伶俐）爲了他自己的福利，並沒有對莫斯科的領袖們之領導中國的內閣主義說一句話，甚至說到鮑羅庭的時候，僅僅用『某些非中國同志』來代替。

譚平山抱怨說他無法把農民運動納入正軌，其塔羅夫對這抱怨虛偽地發怒。可是其塔羅夫勢必知道這正是史大林放在譚平山面前的工作。譚平山在一九二六年年尾，來到莫斯科接受訓令，並且向共產國際全體執委會報告，說他是怎樣努力對抗『托洛斯基主義者』，那即是說對抗那些要求退出國民黨而組織工農的共產黨員們。史大林打電報給譚平山，訓令他約束農民運動，其目的是在不要反抗蔣介石與資產階級的軍事參謀部。同時史大林却譴責反對派……說我們輕視農民。

第八次全體會議，甚至還通過了一個特別的決議，題名爲『對於托洛斯基與烏岳維奇兩同志在共產國際全體會議上演說之決議』：

『托洛斯基同志……在全體會議上要求，用蘇維埃的形式，立即建立兩重政權，並即刻採取打倒左派國民黨政府的路線。這種在形式上（！）是極左的（！！），可是在實際上是機會主義的（！！）要求，不過是舊的托洛斯基主義的立場之重複！是要跳過革命中之小資產階級的



農民階級」。

這裏我們看見反托洛斯基主義之赤裸裸的本質了。牠是：擁護資產階級，反對工人與農民的革命。

## (十二) 領袖與羣衆

一切工人階級的組織，都被『領袖們』利用，用牠去約束、壓制和破壞革命羣衆的鬥爭。底下是其塔羅夫的陳述：

『勞動大會(在武漢開的)一天天的拖延下去，並且當牠最後集會的時候，也沒有任何企圖，想把牠用作爲抵抗的組織。反之，在大會最後的一天，牠還決議在國民政府公署之前，舉行羣衆遊行，其目的是表示他們對於政府之忠誠。(羅佐夫斯基說：我在那裏用我的演說警告了他們)』

羅佐夫斯基簡直不知道羞恥，那時他在那裏活動。他還『警告』中國的工會會員，其實中國的工會會員，就是被他用半生不熟的話語弄得混亂不堪的，羅佐夫斯基在這裏算是成功了，他在中國看不見任何東西，不懂任何東西，不能預見任何東西。這個『領袖』從中國回來寫道：

『無產階級，在中國民族解放的鬥爭中，已經變成支配的力量』(工人的中國第六頁)

無產階級的頭，已經被挾在蔣介石的鐵鎊之上，羅佐夫斯基還說出這樣的話。由此可見赤色職工國際的總書記，是怎樣的欺騙了全世界的工人。在中國工人被衝散以後(由於各種

「總書記」的幫助），羅佐夫斯基竟嘲弄中國工會的會員，說那些「卑怯者」受到警告了，你們知道，這種警告，就是那最勇敢的羅佐夫斯基之豪勇的演說。在這小小的插話裏面，可以看出出現的領袖們的技巧，看出他們的整個機構，及他們的全部道德！

羣衆的革命運動的力量，確實是無可匹比的。我們已經看見，雖然有了三年的錯誤，可的那時上海的情勢，還是有救的，如果我們把蔣介石不當作人民的解放者，而當作勢不兩立是仇敵來迎接。更有進者，甚至在上海政變以後，共產黨員還仍然能在各省加強自己的力量。不過他們是受命要服從「左派」國民黨的。其塔羅夫對於左派國民黨所舉行的第二次反革命中之最輝煌的一頁，加以如下的敘述：

『武漢方面的政變，發生於五月二十一到二十二日……這個政變，是在不可信的情形之下發生的。在長沙，軍隊有一千七百人，而農民的武裝隊則占大多數，集合在長沙的周圍，有兩萬人。雖然有這樣的優勢，可是軍事領袖終究握住了政權，槍殺了所有活動的農民，解散了一切革命的組織，並且建立了牠的專政，這完全因為長沙和武漢的領袖們之懼怯，猶疑和退讓的政策所致。農民們聽到了長沙政變的消息，他們便自己準備起來，打算圍攻長沙。這個進攻，是決定在五月二十一日。農民從各方面調動他們多數的隊伍，向長沙進發。很明顯的，他們不要很大的努力，便可取得長沙城。可是正當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來一封信，陳獨秀在這封信上教他們或可避免公開的衝突，把問題轉移到武漢來解決。（並沒有這封信，事實上中央特派員及湖南省委書記，在馬日事變突發前並未報告中央委員會，而逃走了。——譯者注）湖南省委根據這封信，便下了一道命令，通知農民武裝隊退却，



不要向前進展；但是這個命令，沒有送到某兩個分隊，這兩個分隊，便向武漢進發，結果是被軍隊消滅了』（記錄三十四頁）。

事情的進展，在其他各省，都很相似。在鮑羅庭的領導之下——「鮑羅庭是在警衛着！」——中國共產黨員，都聽命維謹的執行了史大林的訓令：不與民主革命的上層領袖左派國民黨決裂。長沙的投降，是於五月三十一日舉行的，那就是說在共產國際第八次全體執委會決議後幾天以內舉行的，中國共產黨是完全遵從了這些決議。

領袖們確實盡了一切的可能，毀滅了羣衆的興起！

在同一演說當中，其塔羅夫說：

『我以為我有責任宣說，雖然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犯了很長久時期的空前的機會主義錯誤……可是我們決不應責備黨的羣衆，教他們負機會主義之責……我深信（我曾看見過許多共產國際的支部）沒有另一個支部，能像中國支部那樣獻身於共產主義，能像中國同志在爲主義的鬥爭中那樣英勇。任何國家的共產黨員，都沒有中國同志的英勇』（記錄三十六頁）

無疑的，革命的中國工人和農民，在鬥爭中已經表現了特別的自我犧牲。他們與革命一道，被機會主義的領導衝毀了。這種領導，不是廣州，上海和武漢的領袖，而是那從莫斯科發號施令的人。這將是歷史的定評！

### （十三）廣州暴動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國共產黨開了非常會議，牠懲責那以前執行莫斯科訓令的領導

，爲機會主義的政策，卽是懲實牠的一切的過去，並且決定準備一個武裝暴動。史大林的特派密使們，當蘇聯共產黨開第十五次大會的時候，正在廣州準備一個武裝暴動，其目的是在表示史大林在中國策略上之政治的勝利，藉以遮掩他對俄國反對派的放逐。

在革命潮流已退落，而城市的羣衆還非常銷沉的時候，廣州『蘇維埃』的暴動，竟急促的組成了，工人們的行動，是英勇的，但領導者的冒險主義是罪惡的。廣州無產階級之新的潰滅，消息傳到之時，正是十五次大會開會之日。在同樣的情形之下，當史大林擊碎布爾塞維克列寧派之時，也正是他昨日的同盟者蔣介石打毀中國共產黨員之日。

起草新的清算單，又是需要的了，這卽是說需要再一次把責任移轉到執行者身上去。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真理報寫道：

『許多省軍，都一致的向紅色廣州進攻，這證明中國共產黨之最大的最長久的缺點，正在於在反動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卽分化運動太不充分』

『最長久的缺點』！這是不是說，去分化國民黨的軍隊，是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呢？若是的，要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共產國際的中央機關刊物，於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卽上海流血的一個半月以前寫道：『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覺悟的工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應進行分解革命軍的策畧，這爲資產階級的影響，在那裏還相當的強固……』（共產國際一九二七年二月二五日第十九頁）

史大林於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產國際全體執委會上，有如下的演說——而因幾句話是在任何時機常常重複的——：



『在中國，不是徒手的人民，反對舊的統治的軍隊，而是武裝的人民，用革命軍的形式反對後者。在中國，是一個武裝的革命，反抗一個武裝的反革命』

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天和秋天，國民黨的軍隊，被描畫爲武裝的人民。但是當這些軍隊擊碎廣州暴動的時候，真理報又宣說，中國共產黨之『最長久（！）的缺點』，是在於他們的無能去分化『反動的軍隊』，在廣州暴動的前夜，這同一的軍隊還被稱爲『革命的民衆』。

真是一些無恥的騙子們！在真正的革命者當中，還能看得見像這類的事情嗎？

#### （十四）盲動主義的時期

共產國際第九次全體執委會，於一九二八年二月開會，那是在廣州暴動一個多月以後。牠怎樣估計中國的情勢呢？這裏是牠的決議之確切的字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爲牠的一切支部，應當把這個工作當作自己的責任，即：與那些詆譏中國革命業已經完結的社會民主黨和托洛斯基主義者鬥爭』

這是怎樣一種奸詐同時又是可憐的狡猾手段啊！社會民主黨以爲蔣介石的勝利，實際上就是民族革命的勝利（那昏亂的烏爾班士，也迷糊於這同樣的立場）。左派反對派則認爲蔣介石的勝利，即是民族革命的失敗。

反對派從沒有說過而且也從不能說，中國革命是整個的完結了。那被消滅，被混亂，被欺騙和摧毀的，只是第二次中國革命（二五二五——一九二七）。僅僅這個，已足夠表示領導的紳士們之成就了！

我們曾確認從一九二七年秋天開始，革命的退潮，已擺在中國的面前，無產階級是向後退卻，而反革命則已奏凱旋。史大林的立場是怎樣呢？

他於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在真理報上寫道：

『中國共產黨正趨向於武裝暴動，中國整個的情勢，照事實說來，採取這個路線是正確的……經驗的證明，中國共產黨必須集中牠一切的努力於日常的工作，並且要廣泛的好好的作武裝暴動的準備』。

共產國際第九次全體執委會，在盲動主義上，作了含糊兩可的官僚主義的保留，來批准這種冒險主義的路線。這種保留的目的是很明顯的：預先掘些洞穴，讓那些『領袖們』要作新的退却之時好爬進去。

第九次全體會議對於中國的決議，是輕浮而且罪惡的，牠是：新的冒險，新的散戰，打破與羣衆的關係，失去地位，把最好的革命分子葬送在冒險主義的火坑裏，摧毀黨的尙存戰士。從一九二七年中國黨的八七會議，到一九二八年七月八日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在這整個時期，是澈底的滲透了盲動主義的理論與實際。這就是史大林派的領導，給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之最後的一些打擊。

一直到第六次大會上，共產國際的領導者才承認：

『廣州暴動，在客觀上說來，已經是革命退潮時期之退兵一戰』（真理報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啊！是『客觀的』！那麼主觀的呢？那暴動的自覺的製造者——領袖們呢？這是掩飾的承



認廣州暴動之冒險性質。不管怎樣狡辯，共產國際在反對派的意見提出一年以後，尤其重要的是在連續的慘敗以後，也不得不承認中國革命已與武漢時代同時終止，牠不能經過冒險主義來恢復。在第六次大會上，中國代表張飛榮（譯音）報告說：

「廣州暴動的失敗，給了中國無產階級一個更重的打擊，革命的第一個階段，在這樣連續敗北的情形之下完結了，在工業的中心地，工人運動已經感覺到消沉的氣象。」（真理報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第一百六四號）

事實——是一個剛強的東西！這也不得不被第六次大會所承認了。武裝暴動的口號，已經取消了。現在所剩下的事情，不過是「第二次中國革命」的名稱（一九二五——一九二七），把所謂「第一階段」與將來第二階段，用一個無限定的時期來劃分開。這是企圖用術語，來拯救特權，最少也企圖拯救一部分。

### （十五）第六次大會以後

中國共產黨的代表蘇（譯音）某，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六次大會上說：

「只有托洛斯基主義的叛徒們和中國的陳獨秀主義者，說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獨立（？）發展（？）的前途和穩定（？）」

我們且不理這種謾罵，這些不幸的人，假使他們不從事辱罵反對派，便永不能住到洛格斯大廈裏去（莫斯科的洛格斯旅館，是共產國際的許多外國和俄國的官僚們的住所——托洛斯基註）這是他們唯一的財源，譚平山在他投降敵人以前，也會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全體執委

會上，用同樣的態度，大罵過「托洛斯基主義者」。他們那罕有的赤裸裸的無恥，便是企圖嫁罪於我們左派反對派，把「民族資產階級」理想化，並認為牠能「獨立的發展」。史大林的僕從們，如同他們的領袖一樣，都在怒不可遏了，因為第六次大會以後的時代，又顯示了他們完全沒有能力去瞭解環境的變遷和將來發展的方向。

在廣州暴動失敗以後，有一個時期，正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一九二八年二月，指導中國共產黨，走向武裝暴動的時候，我們對於這個路線，曾表示了相反的意見：

現在，情勢將要轉到正相反的方向；工人羣衆將要從政治舞台上，暫時退却下來；黨將要屏弱下去，縱然有農民暴動的持續。軍閥戰爭之滅弱與無產階級罷工暴動等之滅弱，同時將不可避免的把國家導入於經濟生活之某種初步的進程，其結果，將要引起多多少少的商業與工業的活躍，縱然是非常微弱。這種活躍將要恢復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並且將容許共產黨，在正確的策略之下，再來建立牠的關係與影響，那麼這種關係已經在更高的基礎上建立了，則工人的暴動將與農民的戰爭連接起來。這就是我們被他們叫作「取消主義」的內容。

在漫罵以外，蘇某對於中國最近兩年來的事情，還說了什麼呢？首先他說：

「一九二八年，在中國工業與商業上，可以看到一個相當的恢復」他繼續又說：

「在一九二八年，有四十萬工人罷工，一九二九年，罷工的人數，已經達到七十五萬，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工人運動是比較鞏固而且很快的發展。」

很顯然的，我們必須十分謹慎的去相信共產國際所發表的數字，自然蘇某的數字也包含在內。我們且不管那誇張數字的可能，蘇某的報告，正完全證實了我們在一九二七年底與



一九二八年年初的預言。

不幸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却從正相反對的出發點，預計問題。武裝暴動的口號，僅僅在第六次大會上，即是在一九二八年年中，才停止使用。但是在這種純粹查定的決議以外，黨沒有得到任何新的指向。經濟恢復的可能，從沒有被黨考慮一下。罷工運動發展到很大的範圍，但牠是與黨分離的。假使共產國際的領導，不是那樣愚蠢，說反對派是取消主義，並且能及時了解情勢，如我們一樣，那麼中國共產黨將顯然的強固起來了，首先是在工會運動中，這還有一點懷疑嗎？讓我們回憶一下第二次革命中之最高潮的時代吧，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在共產黨的影響之下，有二百八十萬工人組織在工會裏。但是現在，按照蘇某的報告，共有六萬人，這還是全中國的數目！

這些可憐的「領袖」，已經把他們的道路，引到絕望的死巷，已經作了可怕的損傷，還說什麼『托洛斯基主義的叛徒們』，他們以為用這種污蔑，便可弄好損傷。這就是史大林的學校！這就是牠的果實！

## （十六）蘇維埃與革命的階級性

按照史大林的意見，蘇維埃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是什麼呢？在輪到蘇維埃的階段時，什麼地方是指定給牠的呢？牠與那一個階級的統治有密切的關係呢？

當北伐的時候和武漢時代，我們聽見史大林說，蘇維埃只有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以後，只有在無產階級革命的起點，才可建立。正因為如此，政治局完全跟隨在史大林之後，

倔強的拒絕了反對派所提出的蘇維埃口號。

『蘇維埃的口號，不是表示別的，只是要即刻跳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並且組織無產階級的權力』。（摘引政治局對反對派提綱的書面答覆，一九二七年四月）

在五月二十四日，那時正是上海政變之後，武漢叛變之時，史大林證明蘇維埃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不能並立的，他這樣說：

『但是假使他們有了工人代表蘇維埃，則工人將不停留在這上面。他們將要向共產黨說（而且他們將是對的），假使我們是蘇維埃，而蘇維埃是權力機關，那麼我們不能壓迫資產階級一點嗎？不能沒收他們『一點』嗎？這時，假使有工農代表蘇維埃的存在，而不採取沒收資產階級的路線，則共產黨人將變成一些吹牛家。在現在，在革命的現階段上，採取這種路線是可能與應該的嗎？不，我們不應該』。

在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之後，國民黨將變成什麼呢？史大林對於這個，都計算好了。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向學生演講中（我們已摘引經過的），他回答說：

『我以爲在建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并且準備中國的十月革命之時，中國共產黨將要改變現在這種在國民黨內同盟，而變爲與牠作黨外的同盟』。

我們這些偉大的戰略家，預見了一切的事情——的確的，他們預見了一切的事情，可是階級鬥爭。甚至關於過渡到無產階級的革命，史大林還熱心的供給了中國共產黨一個同盟者，這同盟者即是那同一國民黨。爲了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共產黨還只准許與國民黨作例外聯合，而還不與他打破聯盟。如人們所知道的，與資產階級聯盟，是爲準備『中國的十



月革命」之最好的條件。所有這些，都被稱為列寧主義。

無論怎樣，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史大林對於蘇維埃問題的立論，是非常確定的，他把建立蘇維埃與即刻沒收資產階級財產連在一起。在那時候，他確實需要這種「急進主義」，他並不是擁護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反之正是擁護資產階級避免沒收。這種有定見的立論，無論如何是很清楚的：蘇維埃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唯一與獨占的機關。這就是蘇聯共產黨政治局的立場，這就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立場。

但是於一九二七年底，在廣州舉行了一個武裝暴動，這個暴動是被認為有蘇維埃性質的。共產黨員得到了政權，他們宣佈了許多方法，都是帶有純粹社會主義性質的（土地、銀行、房屋、工業企業概歸國有等），這可以說我們是面對着無產階級的革命了。然而不然，共產國際委會第九次全體會議於一九二八年二月底，對於廣州暴動曾作了一個綜結。其結論是什麼呢？

「今年的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期，這個革命還沒有完成……若企圖跳過革命中之資產階級民主階段，同時又估計中國革命是『不斷』革命，這種傾向，是錯誤的，牠與一九零五年托洛斯基所犯的錯誤一樣」

但是在這個決議的十個月以前（一九二七年四月），政治局曾宣說這同一蘇維埃口號（不是托洛斯基主義，而是蘇維埃口號！），是跳過資產階級民主階段而不能允許的。可是現在，當用盡了國民黨的一切變化以後，當需要批准蘇維埃口號之時，我們又聽說，只有托洛斯基主義者，才能把蘇維埃口號與無產階級專政聯在一起。這是史大林表現了當一九二五到一

九二七之時，他曾經是個『托洛斯基主義者』，雖然是繞了別的道路。

真的，共產國際的綱領，在這個問題上，也做了一個決然的轉變，在殖民地的國家之最重要的任務中，綱領上說『建立工農民主專政，須在蘇維埃的基礎上』，這真是不可思議啊！昨天還認為不能與民主革命並立的蘇維埃，今天却宣說牠是牠的基礎了。在這種翻筋斗的把戲當中，我們實在找不出任何一點理論的解釋來。一切的事情，都是在嚴厲的行政方法之下進行的。

史大林在那一方面是錯的呢？當他宣說蘇維埃不能與民主革命並立的時候？還是當他宣說蘇維埃是民主革命基礎的時候呢？在這兩個時候他都是錯的。因為史大林不懂得民主專政的意義，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也不懂得牠們相互間的關係，和蘇維埃在牠們相互關係中所起的作用。

他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六次大會上，對這個問題，雖然只說了幾句話，可是這次表現得最明顯了。

### （十七）在十六次大會上的中國問題

史大林在他那十點鐘的長報告當中，（不管他是怎樣願意這樣做）不能把中國革命問題完全說諸不理。可是他恰好對牠只說了五句話。那幾句話是什麼！真如拉丁人所說的『言簡而意賅』。他避免一切尖銳之點，不敢作一般的概論，更不作具體的預言。史大林在這五句話當中，完備了一切的錯誤留給他將來去完成。



史大林說：「若以爲帝國主義者的惡行，就這樣過去而沒有受到處罰，那真是可笑的。中國的工人和農民已經建立了蘇維埃和紅軍，來答覆了他們。聽人說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個蘇維埃政府。我以為假使這是真的，那麼這裏面沒有一點驚奇。毫無疑義的，只有蘇維埃才能挽救中國免於完全的瓜分和衰亡」（真理報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若以爲……那真是可笑的」，這就是後來一切結論的基礎。假使帝國主義者的惡行，不可避免的激起了回答，而且這回答是用蘇維埃和紅軍的形式，那麼帝國主義者怎樣還仍舊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呢？

「聽人說，中國已經成立了一個蘇維埃政府」。這裏「聽人說」是表示什麼呢？誰說的呢？並且最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對於這個說了什麼呢？牠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呀，牠的代表在大會上曾經發言的呀。這是不是說中國建立了「蘇維埃政府」，與共產黨無關而且連知道也不知道呢？那麼誰在領導這個政府呢？誰是牠裏面的分子呢？是那一個政黨領有這個政權呢？史大林不僅不能給一個回答，而且他連提也不提這個問題。

「我以為假使（！）那是真的，那麼（！）這裏面沒有一點驚奇」。中國建立了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還一點不知道，而中國革命的最高領袖，對於這個政府的政治面目，竟不能給我們一個報告，在這樣事實之下，還說沒有一點驚奇，那麼世上還留下什麼事情去教人驚奇啊！「毫無疑問的，只有蘇維埃才能挽救中國免於瓜分和衰亡」。是那一種蘇維埃呢？時至今日，我們已經看見各種各樣的蘇維埃了：一方面有蔡里特利的蘇維埃，奧特鮑爾和謝德曼的蘇維埃；另一方面則是布爾塞維克的蘇維埃。蔡里特利的蘇維埃，不能挽救俄國免於瓜分和

衰亡。反之他們的全部政策，是向着轉變俄國爲協約國殖民地的方面走的。只有布爾塞維克黨人，才把蘇維埃變爲一種武器，解放了勞動羣衆。中國的蘇維埃是那一種蘇維埃呢？假使中國共產黨對牠不能說出什麼來，那就是表示前者不是在領導後者。那麼誰是領導者呢？牠是與共產黨隔離的，牠的領導者，僅僅是一些偶然的「中間分子」和「第三黨」的人們；總之，那些第二種與第三種的國民黨殘餘分子，能來領導蘇維埃，而且建立一個蘇維埃政府。

僅僅在昨天，史大林還以爲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前，要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是『可笑的』。現在他似乎相信（假使他的五句話，究竟有一些意義的話）在民主革命當中，蘇維埃甚至不要共產黨的領導，也能挽救國家。

說到一個蘇維埃政府，而不說無產階級專政，那就是欺騙工人，而且是幫助資產階級欺騙農民。可是說到無產階級專政，而不說共產黨的領導作用，那就是再一次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爲一個陷阱，來陷害無產階級。無論怎樣講，中國共產黨現在是極其微弱的。牠的黨員之工人成分，只有幾千人了。在赤色工會裏面的工人，大概有五萬人。在這些情形之下，若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即刻的任務，那是顯然不可想像的。另一方面，在中國的南部，廣大的農民運動正自動的發展起來，這裏面有許多游擊隊參加。十月革命的影響，雖然有了多年的不肖門徒的領導，可是對於中國，還是非常之大的，所以農民們把他們的運動，叫做『蘇維埃』，並且把他們的游擊隊叫作『紅軍』。這又表示了那時史大林的庸俗之深刻，當他出來反對蘇維埃的時候，他說我們決不能用『人工的蘇維埃化』，把中國人民羣衆嚇走了。只有蔣介石能被蘇維埃嚇走，工人與農民是不怕蘇維埃的；在一九一七年以後，蘇維埃對於工人和農



民，已經變成了他們解放的象徵。中國的農民，很明顯的，對於蘇維埃的口號，寄託不少的幻想。他們是可恕的。但是那些領導的尾巴主義者，把自己限制在卑怯的含糊兩可的概念中，而寄託許多幻想於中國的農民，不向無產階級解釋事變的真實意義，這是可恕的嗎？

史大林說『這裏面沒有一點驚奇』，那意思即是中國的農民，沒有工業中心的參加，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也能建立一個蘇維埃政府而沒有一點驚奇。但是我們說，在這種情形之下，蘇維埃政府之實現，是絕對不可能的。不僅布爾塞維克的蘇維埃，就是蔡里特利的政府，或者半政權的蘇維埃，也只有在城市的基本上才能實現。若以為農民能夠獨立的建立他的蘇維埃，那就是表示相信奇蹟。要建立一個農民的紅軍，那是同樣的奇蹟。農民的游擊隊，在俄國革命中，起了偉大的革命作用，可是牠是在城市中已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和有了集中的無產階級的紅軍之下，完成牠的作用的。因為現時中國工人運動之薄弱，而尤其薄弱的是中國共產黨，所以若以為無產階級專政是中國目前的任務，那是難以說到的。這就是為什麼史大林不願他過去一切的言論，緊隨在農民暴動之後，被迫的把農民蘇維埃和農民紅軍，與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接合起來的原因。這種專政的領導，對於共產黨是一個太重的工作，牠是讓給某些別的政黨，或者可以說讓給一個未知的革命黨。因為史大林阻得了中國工人和農民，不去引導他們的鬥爭到無產階級專政，所以現在一定要有一些人，把蘇維埃政府拿在手上，當作資產階級民主專政的機關，以幫助史大林。史大林還給了我們五句話算是五個論證，作為這種新的前途之發動力。那就是：（一）『若以為……那真是可笑的』；（二）『聽人說』；

（三）『假使那是真的』；（四）『這裏面沒有一點驚奇』；（五）『毫無疑意的』。這裏就是那行政的

論據之最權威與顯赫的地方！我們預先警告：在這種整個的可恥的計謀之下，中國無產階級將要再一次付給重大的犧牲。

### （十八）史大林『錯誤』的性質

世界上有許多許許多多的錯誤。在人類思想的各種範疇內，有時會發生重大的錯誤，其來源或因考察對象之不足，或因既成事實之不充，有的則因事件的因素過於複雜難以思考，如此等等。在這些錯誤之中，我們可以說氣象學家在預報天氣上的許多錯誤，是政治範圍裏面一種整個的連續的錯誤之模型。一個有學問的敏於理解的氣象學家，比較一個小有經驗的庸俗的天氣預測者，其對於科學是有用得多，縱然後者有時也偶然的被事實所證明。假使一個有學問的地理學家，一個極地探險隊的領袖，他的出發點，是認為地球是位於三個鯨魚上面的，那我們將要說他什麼呢？然而史大林的許多錯誤，幾乎完全屬於這個範疇。史大林從沒有接近馬克斯主義，把馬克斯主義當作方法，他只是很拘泥的利用一些『像馬克斯主義』的形態，他在實際行動上，便以最粗魯的經驗主義的偏見，作他的出發點。但這正是事情發展的辯證法：那許多偏見，在革命低落的時代，却變成了史大林之主要的力量。也正是那些偏見，使他演了他主觀上不願有的作用。那笨重的官僚制度，從取得了政權的革命階級分離出來，牠攀緣在史大林的經驗主義之上，因為他是唯利是圖的，因為他在一切的原則上是完全的專橫主義，所以使他成爲牠的領袖，造成史大林的神話，而這神話正是官僚制度自身的節目傳奇。這就是爲什麼和怎樣發生下面這種現象的解釋：那些頑強而絕對中庸的人，在革命高漲的時代，只佔在二四等作用的地位，可是在革命退潮時代，在世界資產階級穩定的時代，在



社會民主黨復生的時候，在共產國際之衰弱與蘇維埃官僚制度在廣大的範圍內向保守方面隨落的時候，却被聘來當主角了。

法國人常說一個人：「他的缺點乃是他的優點」。說到史大林，那正可以說：「他的缺點，證明了對他有利的」。階級鬥爭的輪齒，陷進了他那理論的貧乏，政治的順應性和他的精神的癡亂上面去，簡言之即陷進了他的許多缺點中去，使他不能成爲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者，使他變成了小資產階級從十月革命、馬克斯主義、布爾塞維克主義脫離出去的時代政治家。

中國革命是史大林的新的作用之考驗，可是從相反的方面。由於在蘇聯取得了政權，由於那些放棄國際革命的階層之幫助，更由於間接的但是非常實際的敵人之幫助，史大林自動的變成了共產國際的領袖，並且也只有由於這些，又成了中國革命的領袖。官僚機構之幕後的保守的英雄，在大革命潮流的事變中，也必須表現出他的方法和性質。在這個潮流當中，史大林的作用，表現得悲慘的自相矛盾。他教中國工人附屬於資產階級，制止土地革命，擁護反動的將軍，解除工人的武裝，阻止蘇維埃之實現並且消滅那些已經實現的，作了這些以後，史大林還完成了蔡里特利僅僅企圖在俄國完成的歷史任務。其不同之點是：蔡里特利在公開的舞台上活動，他受到布爾塞維克的反對以後，就企圖把被錄鏽被欺騙的工人階級，販賣給資產階級，他必須即刻並且當場負擔這種責任的。至於史大林在中國的活動，自始即是藏在幕後的，他被一個有權的機關所掩護，而且懸掛着布爾塞維克的旗幟。蔡里特利，藉資產階級來鎮壓布爾塞維克的權力以支持自己。而史大林則由自己把這種壓迫施諸布爾塞維克

列寧派（反對派）。資產階級的鎮壓，被革命的高潮所打碎。史大林的鎮壓，則被革命退潮所

撫育。這就是爲什麼史大林能夠用純粹的孟塞維克政策，在中國革命中，一直試驗到底的原因，亦即是說試驗到最悲慘的失敗之原因。

史大林的政策，最近有了一個左傾的突變，這是什麼一回事呢？在這個階段裏面（這個向左盤旋和牠所有的意義加起來，將構成歷史上一個階段），只有那些非常短視的人們，不了解人類覺悟的辯證法與歷史發展的辯證法之關係，才會看出牠與以前史大林的政策，有一種矛盾。革命的衰落與牠的上漲一樣，不是沿着直線進行的。革命退落時的經驗主義的領袖，在一定的時候，勢必要驚恐自己之身臨叛變的深淵，當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的時候，他正是被他自己的政策，趕到這深淵邊緣，而且他是被無產階級的敵人和半敵人利用的。哥德說『你以爲你自己在動，其實你是被推着走了』，這裏正是這樣。因爲官僚機關之走向退化，不是一個平衡的進程，因爲羣衆當中的革命傾向還非常強固，所以從特爾米多的深淵之邊緣，轉變到左邊來，即刻就有充足的擁護和保持的力量。這個轉變，帶有一種恐慌的跳躍性質，這正因爲這個經驗主義者，不能預見任何事情，（直等到他臨近峭壁懸崖的時候，他才知道。這種向左跳躍的觀念，還是左派反對派替他準備的，左派反對派被迫只能利用牠的一些零碎的工作，以適合於一個經驗主義者。但是這種左傾主義之尖銳的暴發，並不改變官僚制度在演進上的基本進程，也不改變史大林自身的性質。

史大林之缺乏理論的準備，缺乏廣大的觀察力和創造的理想力——若沒有這些特點，便不能在廣大的範圍上進行獨立的工作——就完全解釋了爲什麼列寧曾估計史大林是一個實際工作的助理人，並且他向党提議，把史大林從總書記位置除去，這已經是很明白的說，這個



位置，一定要帶有獨立的意義。列寧從沒有把史大林當作政治的領袖看。

史大林在一切重大的問題上，他自身是常常而且不變的保持着機會主義的立場。假使說史大林與列寧沒有什麼重大的理論或政治的衝突，如同布哈林、卡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甚至賴可夫那樣，那不過是因為史大林從來不曾堅持他的原則的意見，並且在每次發生不同意見的時候，總是保持靜默，退到旁邊，在那裏等待。但是因為如此，列寧常常與史大林有實際的組織道德上的衝突，這些衝突常常是很尖銳的，正因為史大林的那許多缺點；列寧對於那些缺點，在他的「遺囑」上，雖然在形式上批評得很謹慎，可是在本質上是非常無情的。

在以上所述的以外，我們還要說明一個事實：列寧曾與一羣共同工作者，手攜着手的進行工作，那些共同工作者，每人對於工作，都增加了知識，都有個人的創造力，都有卓越的天才。可是史大林的周圍，則圍繞着一些十足的庸俗人物，特別是在他清除右派以後，他們缺乏任何一點國際的觀察力，而且對於世界工人運動中之一個簡單的問題，也不能產生一點獨立的意見來。

同時，官僚機關的權威，自從列寧死後，就變得極其巨大。史大林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正是利用那巨大機關的權力，以造成那理論、政治、和民族限制的混合品之結果。史大林已經證明他自己不能學習了。他在第十六次大會上對中國問題所說的五句話，是澈頭澈尾的滲透了他那系統的機會主義，這個機會主義，是在中國人民鬥爭以前的一切階段上，統治着史大林政策的。中國第二次革命的負責人，現在正在我們的眼前，準備絞殺中國第三次革命，當他開始的時候。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於普林基堡